



骏马奖作家观察(十七)

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民族文学书写以其独特的音色不断丰富着我们对文明多样性与人类精神谱系的理解。它们既是特定族群历史记忆的文学转译，也是人类共通情感与精神处境的艺术呈现，更是穿越时空、抵达普遍人性的悠远呼唤。

出生于龙门山断裂带上的作家羌人六，以其深植于羌族文化土壤的创作实践，完成了一次从个人经验到民族记忆、从地域书写到人类共通命题的精神跋涉。他的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小说等多个门类，虽文体各异，却在精神脉络上相互呼应，共同构建了一个既扎根于羌族文化深处，又面向广阔世界开放的文学宇宙。通过这些文字，作家梳理出一个民族的来路，并探寻他们的去路。羌人六坚信，“我就是我的土壤，我就是我的道路”，这土壤与道路，正是来自对文字的坚守，来自悠远深邃的羌文化。

“想走的路，一定会到”

羌人六出生于四川平武的羌族聚居区，其创作多以故乡所处的断裂带为核心，并将这一地理概念升华为文学母题。他的作品深刻记录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下的变迁，并通过对比羌族史诗与文化的文学重述，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切思考。

在处理民族历史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上，羌人六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成熟的叙事智慧，在宏大叙事与个人书写之间建立了富有张力的对话关系。他的创作多从关注个体命运出发，收录在《食鼠之家》中的文字都是其创作起步阶段的作品。同名散文《食鼠之家》源自作者早年的家庭经历，作品通过对个人与家庭往事的审视，将具体的生活苦难转化为对生存智慧的探讨。散文集《绿皮火车》是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技法上臻于成熟。作品仍以故乡为背景，用平静舒缓的笔墨讲述震撼人心的生活，其中蕴含着作者坚韧的信念、真挚的爱意和朴素的情怀。文集收录的篇什多是个人观察、回忆与思考，但却从未局限于对个人经验的咀嚼，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更大历史脉络与文化背景的关注。散文的私人性与非虚构性，反而为理解更大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入口。《无根者》书写青年步入中年的困惑，既是自我反思，也是对时间流逝的哲思。

“想走的路，一定会到”，这是羌人六在长篇小说《尔玛史诗》后记（即创作漫笔《古花古谢，今花今开》）中的话，也是作家一直以来坚持的创作信条。可以说，其所有的创作，都经历了长久的资料考古。《尔玛史诗》更是如此，羌人六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涉猎民间文学资料和相关论著万余字。文末所附长篇创作漫笔，是解读小说无法绕开的一个互文本。这种文献学意义上的爬梳，不是简单的素材堆砌，而是对羌族文化体系的深入理解与重构。作品聚焦于羌族最具代表性的几大史诗，兼及数十种其他史诗，并从中汲取养分，内容涵盖生产生活、转移迁徙、爱情婚姻、战争与和平等多个主题，完整勾勒出羌族文明从原始走向理性的发展脉络，让上古歌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在字里行间自然流淌。值得注意的是，羌人六在处理这些古老题材时并非简单复述，而是在原汁原味保留民间底色的同时，赋予其当代价值与崭新的表达形式。正是这份对文字的执着与坚守，使其“想走的路，一定会到”的创作理念得以如愿。

初识王新梅这个名字，要追溯到2013年，当时有人向我推荐了她的一篇短篇小说。在作协的日常工作中，此类推荐颇为常见，但王新梅的小说让我眼前一亮。尽管故事围绕教育领域的平凡事件展开，情节并不复杂曲折，但其中的细节描绘生动真实，足见其深厚的生活积累。小说叙述节奏恰到好处，文字精准有力，充分展现了她的创作天赋。发掘文学新秀、培育文学人才，始终是作协的重要工作，王新梅的出现不仅令人欣喜，更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

后来，我在参加一场文化活动时与她相遇。当着很多人的面，我赞扬并鼓励了她。之后，她又将新写的小说发送给我。尽管这些小说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整体上是立得住站得住的。我告诉她，新疆当前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中，能达到她这种水平的不多。背后的深意，是希望她能意识到自己已具备了小说创作的基本素养，只要持之以恒，定能在创作之路上走得更远。后来，我们推荐她参加了上海的写作培训班，期望她在文学的天地里能有所成就。

诚然，王新梅的创作潜能已经显现，然而她未来在小说创作领域将有何作为，无人能够预知。那些曾怀抱文学梦、一起“爬格子”的伙伴，有多少在途中走散、消失无踪；真正能够持之以恒并有所收获者，实属凤毛麟角。要在文学事业上有建树，个人必须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写小说是个苦差事，谁都不可能轻易成功。

对王新梅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早在23岁时，王新梅就在《回族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秋季无风》，起步不能说不早。如果从这个时候起，她就能在文学创作上全力以赴，怕是多年前就被众人所知了。据她自己说，是因为求学结婚生子耽误了。其实沉寂一段，认真去生活，对作家来说未必是虚度。让文学之缘结出文学之果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会完全一样。也许，王新梅一直胸有成竹地走在她的文学之路上，只是别人不了解她罢了。

转眼12年过去，我也已经退休数年，此时再看王新梅，不但没有一点担心，反而倍觉欣喜。从2014年起，她的小说频频在新疆和其他省市的重要文学期刊上亮相，获得了“西部文学奖”“天山文艺奖”等荣誉。大家都为她高兴，她也在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创作上的自信，越发坚定了写出优秀小说的志向。

《哈熊沟的秘密》应该是王新梅第4部小说集。这些年她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大部分在创作阶段都会发给我，让

故事的种子藏在现实生活中

——读王新梅《哈熊沟的秘密》

□董立勃

我提意见。由于工作和年纪的关系，新疆有不少作者会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但能像她这样认真听取我意见和建议的并不多。我想，王新梅能在写小说上进步那么快，应该是和她善于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分不开的。

写小说这个事，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些技巧必须要掌握。重要的是讲出你想讲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无到有，像一棵树从地底上长出来，没有强大的想象力是虚构不出来的。但前提是得把故事种子找到。这个种子不能凭空取得，它埋在脚下的泥土里，藏在现实生活中。王新梅的人生经历并不坎坷，但她凭借女性特有的感受力和作家敏锐的观察力，仍然能不断从人世寻找找到一些金子般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故事，使自己的小说闪出独有的艺术之光。

通过和她聊小说，我发现几乎在她每次创作前，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人的事让她受到触动。她的创作灵感总是与某个具体的人生经验相关。她似乎不自觉地就领悟了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真谛。又如其人，她在生活中是个诚实的人，写小说时也努力保持着她的真诚，真诚到恨不得让小说中的每个细节都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为的就是要让读者在读她的小说时，相信她讲的故事建立在强大的情理逻辑之上。这样的创作态度可能有时难免会让她的小说略显平淡，缺少一点跌宕起伏的撞击，但于缓缓溪流流淌般的平静叙述中，人性善恶美丑冲突的场景得以逼真地呈现，反而有一种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也许恰恰就是王新梅小说的不同凡响之处。

谈到小说《大雪小雪》时，她说：“小说写的是教育行业的人和事。那些都是我熟悉的。因为熟悉，小说需要的场景、教学术语、人物语言等素材和细节，手到擒来。”谈到《哈熊沟的秘密》时，她说：“灵感和素材还是来自自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一个善于从自己的生活中取材，从人世寻找故事的作家，大概永远不会陷入素材匮乏的困扰。

前几天，王新梅又拿一篇新写的小说让我看，我看完以后告诉她，以后你写的小说不用再找我看，因为我很难再找到值得修改的毛病了。也就是说，从她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了，尤其是近十几年的潜心创作，王新梅用她不断发表的作品向世人证明，在文学这条道路上，她越来越成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该如何把灿烂的文学理想变成美好的现实，相信她早就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安排。

（作者系新疆作协原副主席）

展现古老民族的精神迁徙史

——羌人六创作论

□刘小波

羌人六的创作将民族历史与个人视角相结合，通过神话思维、诗性语言、意象系统和史诗气魄的多维建构，使羌族文化以生动的文学形式焕发新的生命力，不仅在叙事层面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波澜壮阔的精神迁徙史，更在方法与价值的层面，为当代民族书写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范式



植根于断裂带的文化土壤

地缘情结是羌人六文学创作特征的重要来源。龙门山断裂带不仅是羌族文化生存的实体场域，更是其精神原乡。何为断裂带？它既是地理上的断裂，也是时代之变、人心之变，既是灾难的代名词，也是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韧性。羌人六的多部作品都围绕此展开。

《伊拉克的石头》中的小说多以龙门山断裂带为地理与精神背景，聚焦地震灾难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变迁。作品刻画了留守妇女、打工家庭、乡村少年等群体的现实生存境遇，交织着地震创伤、生活压力、个体情感与道德挣扎。作者以冷静细腻的笔触，呈现断裂带上“生活断裂”与“精神重建”之间的张力，在苍凉与疼痛中探寻人性深处的坚韧与善良。该书既是地震记忆的文学赋形，也是对当代乡土变迁的深刻书写。小说集《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持续构建作者专属的文学故乡，以断裂带及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生活为背景，多角度再现了父老乡亲的日常命运与人事沧桑。

在《绿皮火车》中，断裂带这一意象的建构更为成熟。羌人六将断裂带从现实的地理概念，升华为一个核心的文学意象，既是地质上脆弱的地震带，也是精神创伤记忆之源。作者对断裂带的书写，是一次深刻的审视与和解之旅，他并不回避其中的矛盾与创伤，而是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将个人与父辈的遭际置于这片土地的集体命运中进行观照，最终导向与过往尤其是与父辈的和解。到此，断裂带超越了物理与情感的破碎性，成为作者确认写作身份与精神根源的坐标。它从“深不见底的痛”升华为一个有来处、亦有归途的文学故乡，完成了

从地理名词到精神家园的蜕变。

这种地缘认同在《尔玛史诗》中进一步升华为民族认同。文献基础与地缘情感的互文，使《尔玛史诗》既具有文化志的学术价值，又充满文学表达的个性锋芒。作者穿梭于历史与当代、族群与个人之间，将古老的羌族神话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叙事。断裂带上的灾难与坚韧，与羌族古老神话中不屈不挠的精神血脉相通，“断裂”也由此辩证地转化为文明赓续、生命坚韧的证明。

总而言之，羌人六笔下的断裂带，是一个从具体地理概念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综合性意象，凝聚了地理、时代、人心与民族精神的多重意蕴。它既是大自然的力量，也是淬炼重生、凝聚民族精神的基石；既是作家的家乡，是承受汶川大地震重创的物理空间，更是他的精神原乡。

创造一种对话的可能

作为羌族作家，羌人六的创作既是深刻的民族文化寻根，也是对民族在现代性进程中生存状态的审视与叩问。

创作伊始，羌人六就锚定了羌文化这一方沃土。长诗《太阳神鸟》的创作融入了羌族的民族密码，同时展现了诗人对城市化浪潮中乡村命运的观察与思考。关于“羊图腾”的传说频频在他笔下出现，这同样也和羌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在羌人六的书写谱系中，羌族文化的呈现体现为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一是在《食鼠之家》《绿皮火车》等散文及《羊图腾》等诗歌中，将羌族的生活智慧、伦理情感以及面对苦难的坚韧，内化于对断裂带日常经验与个人命运的具象描摹之中。二是在《尔玛史诗》中，走向对羌族文化源流的系统性文

最深远的抵达始于最执拗的返回

——评韩玲《出山记》

□姚复科(土家族)

了“代言人”的幻觉，使她回归到一个更本真也更艰巨的身份：一个在故乡面前永远的学生，一个孜孜不倦的探寻者与对话者。

如果说“书写”聚焦于流动的当下，那么“打捞”则意味着逆时间之流而上，从消逝的洪流中抢救那些即将沉没的文化碎片与历史记忆。

韩玲的打捞，精准地锚定在两个维度：具体的“物”与集体的“记忆场”。以《牛皮船上的风声》为例，牛皮船这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交通工具，在她笔下凝结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与生命哲学。她细致复原其制作技艺，每一次捶打、每一次捆绑，都被赋予文化的温度。当非遗传承人靳老伯以抚摸老羊背般的手势抚摸船体时，“物”与“人”在漫长互动中建立的生命联结便清晰呈现。韩玲打捞的正是这种“相依为命”的人与物的关系，以及其所承载的智慧与尊严。

这种打捞同样深入家族与族群的“记忆场”。在《故乡的年味》中，她打捞的是日渐稀薄的集体仪式与情感结构。母亲轻声哼唱“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的瞬间，被韩玲敏锐地捕获并定格，这句唱词是文化转型最微小也最深刻的声响。记忆在这里不是怀旧的素材，而是理解当下身份焦虑与情感失落的关键密码。

韩玲的打捞具有一种清醒的辩证意识，她对“出山”意义的思考充满洞见：“出山见众生，也被众生见……大成者得到时代环境和个人机遇的红利，而大部分人在做平凡而普通的完成，两者之间，并没有谁比谁更高尚或者高贵。”这种平视的、去浪漫化的眼光，使她的打捞避免了偏执，打捞是为了理解和铭记。

《出山记》全书回荡着一个核心的辩证旋律：出山与归山。这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地理与精神轨迹，更是作者本人写作的隐喻。

“越是萧索的地方，生长的人群却是活得更加热烈、蓬勃甚至自欺。我也一样，像一粒尘埃，游离在这片荒原之上。精神和身体一回回翻过将我重重围困的连绵群山，却又一回回毫无意外地落回故乡。”正是这种“游离”与“回归”的循环，构成了她与故乡的动态关系，也塑造了其散文内在的张力结构。

“出山”是面向广阔世界的必然渴望，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族群的普遍命运。没有“山外”的参照，“山里”便只是混沌的存在。然而，真正的精神“归山”，却发生在“出山”之后，发生在意识到自我与故乡的“陌生”之时。近十年来“囿于山中”的自觉选择，是韩玲一次决定性的精神归航。通过书写与打捞，她试图“拉近我和故乡之间的距离”，与这片土地建立“共同命运感”。此时的故乡，于她不再是原初的、不言自明的家园，而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反复对话、艰难共建的“文本”与“场域”。

《出山记》以其沉静、笃实而充满张力的书写，证明故乡有着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阅读和写作仿佛一束光在前头，引导你去相信，相信相信的力量。”这“相信的力量”，正是作者从对故乡无数次的书写与打捞中，最终收获的坚定内核。《出山记》不仅是一部关于特定地域的人文地理志，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获一处不朽的“精神故乡”的启示录。它告诉我们，最深远的抵达，往往始于最执拗的返回。

（作者系评论家）